

“末位即淘汰”，考核处理岂能如此任性？

《工人日报》窦菲涛 赵紫涵

“2023年的年终奖基本没有了，单位也没说明考核标准，只是口头通知考核结果。”前不久，30岁的职场妈妈路青因连续两年绩效评为C，收到了被裁员的通知。

记者采访多名职工发现，路青的遭遇不是个例。不少用人单位时常将绩效考核情况与劳动者收入、岗位能力相挂钩，一些劳动者因考核不达标被降薪、调岗甚至“末位淘汰”。有劳动者疑惑道：“考核就是简单地处罚吗？这些操作科学吗？”

“考核打分的标准是什么”

拥有博士学位的路青从事研发工作。2023年7月，休完产假后，路青返岗上班，“我完成了所有的项目，工作量不比其他人少，连哺乳假都没有休，绩效却被评为C，我觉得很不合理。”

“我不知道考核的过程和标准，领导说2022年我怀孕，没有给我大于C等级的工作量，2023年复工时间短，不能快速进入状态……”连续两年绩效考核被评为C，让路青很无奈，但坏消息并没有结束。得知考核结果10天后，路青突然收到了自己被裁员的通知，“理由是公司经营亏损，我们

部门只有我一个人收到通知。”现在，路青正在和公司商讨办理离职手续。

末位即淘汰，违法

2023年10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一则关于劳动者被末位淘汰的案例引发关注。

案例中，林某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保险管理工作。2021年10月，该公司为激发员工积极性，制定了末位淘汰制方案，规定考评排在末位者降薪30%并转入待岗培训或解除劳动合同。当年，该公司公布考评结果，林某排在末位。2022年1月，公司对林某进行约谈，以其考核排名末位、能力不足、不能胜任所在岗位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

林某认为，自己并未见过末位淘汰制方案，公司依据该方案将其辞退，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法律允许用人单位自行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但应当经民主程序讨论并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方可确定，且应向劳动者予以公示。因该公司未能举证末位淘汰制系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已向林

某公示，因此该制度不能作为解除与林某劳动关系的依据，该公司应当向林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所谓末位淘汰，归根结底还是以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将其辞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张雪薇解释，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者调岗，未经上述调整或培训即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需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张雪薇表示，有的用人单位不重视绩效制度的订立、实施，常出现单位的绩效规章适用多年，但法院审查后发现，制度的订立与变更从未与职工协商，亦无任何向劳动者送达、告知的记录。

“建立绩效考核异议程序”

“绩效考核本身并不违法。”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符燕培表示，绩效考核是检验劳动者能力是否符合岗位要求的手段，是用人单位行使经营自主权的体现，在制度合法且经过民主程序后，可以将考核结果应用于后期员工的岗位调整中，确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合理限度内的调岗。

符燕培告诉记者，用人单位制定的绩效考核标准和办法，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确定后，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方能认定有效。

“用人单位可以建立绩效考核异议程序。”张雪薇认为，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其公布的绩效考核计算方式进行核算，不得在未告知劳动者的情况下，对相关数据进行“再加工”，也不得以“最终数据以公司计算为准”排除劳动者监督、提起异议的权利。

除了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符燕培认为，用人单位还应从观念上回归绩效考核的本源，“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能力，确保考核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不能通过考核对劳动者随意调岗、降薪甚至开除。”

“考核指标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制定，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劳动者的的工作状态。”张雪薇认为，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能较全面地描述劳动者的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效果，使用单位的整体发展与劳动者的个人发展位于同一轨道，推动用工双方互利共赢。（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男子被骗数万元！婚恋交友App藏着多少“陷阱”？

新华社 鲁畅 孟含琪 吴文诩

近年来，网络婚恋交友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增速明显，手机应用商城上多个排名靠前的婚恋交友App下载量过亿。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平台用户信息审核不严，伪装身份诈骗钱财，甚至衍生出平台账号买卖等“黑灰”产业链。

法律人士表示，要督促平台加强信息审核把关，通过技术手段清理整顿虚假注册等乱象，设立快速响应投诉举报机制，加强诚信网络空间建设。

不法分子 利用婚恋交友App诈骗敛财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利用婚恋交友App诈骗案件。当事人马某某报案称，在某交友平台上添加了一名昵称“迷人宝贝”的陌生网友。该网友自称是一名女检察官，是刚离婚的单身母亲，没聊多久就对马某某表示好感，双方在网上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此后，对方多次以孩子出车祸、介绍工程项目等理由向马某某借钱，两个月内马某某共向对方转账3.4万余元，在一次次要求视频和线下见面未果后，马某某意识到被骗。

办案民警介绍，这名所谓的“女检察官”实际上是河北某地一个男性菜农，把账号注册成女性，编造身份和男用户聊天，发现马某某动感情“上钩”后，便开始连续骗钱。

记者注意到，此类案件近年来在多地频发，不法分子“钻”婚恋交友App用户信息审核把关不严的漏洞，轻易实施诈骗，有的金额巨大。

去年，山东警方破获系列婚恋交友类诈骗案件，捣毁69人婚恋交友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500余万元。诈骗团伙人员在某交友平台上把自己包装成女性角色，拉近距离后便诱导对方以给其购买鲜花、衣物、化妆品等理由在虚假购物链接上付款，还引导被害人在虚假平台软件上进行充值。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的侦查员分析此类案件特点时表示，婚恋交友诈骗较为常见，不法分子作案套路简单，通常利用网络伪装成“金融白领”“商业精英”“军官”“公务员”等身份，骗取事主的感情和信任，接着编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

信息不对称 为诈骗等违法犯罪留下“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婚恋交友平台信息不对称特点突出，用户只要充值百十元就能获得查看其他用户个人信息或来访记录等“权限”，这为不法分子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衍生出会员账号买卖等“黑灰产”。

去年8月，北京警方打掉一个网络黑产犯罪团伙。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主要有3名嫌疑人，一人负责招揽客户注册婚恋交友平台会员账号，两人负责将收购来的会员账号转卖给电信诈骗团伙，非法获利26万元。

据介绍，该团伙以某婚恋交友平台需要“凑人头”冲业绩为幌子，如帮忙注册会员账号可以领取商家50元至140元不等的“补贴”。

为了在婚恋交友平台实施诈骗，一些诈骗团伙还在社交平台发布“有偿租用微信号”等消息，吸引人上钩。在北京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中，嫌疑人以100元24小时的价格将自己的微信号、QQ号“出租”，结果对方使用其账号关联注册某交友平台账号，骗走一名当事人8700元。最终，嫌疑



图为北京警方起获的犯罪工具(北京警方供图)

人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依法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婚恋交友平台的“活跃用户”，通过充值升高等级，可以在查看他人信息寻找作案目标的同时更好隐藏身份。其中，有的用户发布“软色情”信息暗示可以提供嫖娼服务，实则进行“裸聊”诈骗；有的冒充“红娘”，收取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介绍费”。

据介绍，平台虚假注册乱象增加了公安机关打击和整治难度。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反诈民警边界恺说，在查办相关案件中，常常发现平台账号的注册人不是诈骗分子本人，给警方排查带来不小挑战。

提升治理精准度 推进诚信网络环境建设

由于婚恋交友服务高度同质化，许多平台失去资本支持，盈利模式趋于单一，并在疏于监管之下产生许多灰色地带。

记者注意到，婚恋交友平台乱象长期存在，大量网友在“黑猫投诉”等平台发起

投诉，反映维权难。对此，专家建议加强监管治理，让规模高达数十亿元的网络“脱单生意”良性发展。

“要在平台运营成本与保障信息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加大技术上的投入。”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一些有标准、可量化、提供成本不高且有必要进行核实的信息，可要求用户提供后与相关部门对接进行查询验证，确保某些关键信息真实性。此外，平台自身也应通过技术手段识别违规信息，发现违法活动，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全龙杰认为，针对一些小众交友App使用门槛低、隐蔽性强等特点，需要加强监督检查和整治工作。

北京警方同时提醒，网恋需谨慎。如果在交往过程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对方还以各种理由引导汇款，很可能就是在实施网络诈骗。发现被诈骗后，要及时保留联系记录、汇款账户等相关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